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08

# 论胡赛尼小说《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

王育平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当代阿富汗和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阿富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亦难逃战争阴云的笼罩。不同于传统战争书写的宏大叙事,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采取了和战场上士兵不同的平民视角,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捕捉战争的幽灵,通过再现战争为个体带来的直接生命体验和对个人生活历程的影响,把战争日常生活化。在对战争的日常生活化书写的基础上,胡赛尼的小说也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了对阿富汗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问题,为战乱之后阿富汗的文化重建播下希望的种子。

**关键词:**胡赛尼;《灿烂千阳》;战争书写;日常生活;文化重建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057-06

## 引言

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胡赛尼(Khalid Hosseini, 1965—)自2003年初登文坛以来,一直受到评论家的关注。《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2007)是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作品以两位阿富汗女性在20世纪后半期战乱频仍的动荡局势下的悲惨生活为主线,勾勒出阿富汗女性在战争戕害、父权重压的多重危机中夹缝生存的困境。小说中,玛丽雅姆出生于1959年,是赫拉特富人扎里勒的私生女,从小和她的母亲娜娜生活在赫拉特城外的泥屋中。玛丽雅姆15岁生日那天,为了见到父亲,不顾娜娜的反对只身来到扎里勒在赫拉特的家中,而娜娜则在她离开之后自杀身亡。玛丽雅姆的私生女身份使她处境尴尬、不为扎里勒的三个妻子所容,加之母亲的自杀让她异常痛苦,仓促嫁给了年逾四十的鳏夫拉希德。玛丽雅姆婚后随拉希德来到喀布尔生活,短暂的平静生活因她的流产和丧失生育能力而结束,此后的玛丽雅姆长期生活在拉希德的身心虐待之中。莱拉于1978年出生在和玛丽雅姆同一个街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莱拉的父亲上过大

学,曾做过教师,注重对莱拉的教育。莱拉的母亲原本美貌聪慧,但在两个儿子参军阵亡后万念俱灰、整日卧床,没有对莱拉尽到做母亲的职责。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喀布尔没有盼到热望中的和平安宁,反而陷入各派武装势力混战的漩涡。战争迫使莱拉青梅竹马的爱人塔里克随家人离开阿富汗,而莱拉一家在搬离喀布尔前夕被炮弹击中,莱拉痛失双亲,被拉希德和玛丽雅姆所救。拉希德设计欺骗莱拉,让她相信塔里克已死。为了保住自己腹中塔里克的孩子,莱拉嫁给了年逾花甲的拉希德。此后一起生活的9年中,玛丽雅姆对莱拉的态度从敌视渐渐变为友好、爱护,最终在拉希德要杀死莱拉时挺身而出,打死了拉希德并一力承担罪名,让莱拉和塔里克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喀布尔,开始了新的生活。小说的时间线从20世纪50年代起,延伸至21世纪初,涵盖了阿富汗社会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战争成为整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是作品在关键时刻情节发展的助推器。

战争是世界文学中反复呈现的母题之一。在历史上,“战争是一个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的现象

收稿日期:2020-08-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WXB001)

作者简介:王育平(1978—),女,河南焦作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研究、文学翻译研究。

……它能够使国家混乱、使人民离散、使土地遭受劫难”<sup>①</sup>。正因如此,战争书写对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提出了挑战,致使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无奈呼告:“我如何能够绘其全貌?唯有神力方能面面俱到。”<sup>②</sup>作为一个“从各种战争中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国家”<sup>③</sup>,美国是战争文学生长繁荣的沃土。战争书写传统在美国文学中源远流长,历史上曾出现了库柏、克莱恩、海勒、海明威等书写战争场景的知名作家。当代美国文坛也不乏优秀的战争小说家,如奥布莱恩、鲍尔斯、克雷等。不同于这些知名战争小说作家对战场场景和战争英雄的直观描摹,美国移民作家胡赛尼的作品《灿烂千阳》通过平民的日常生活叙事视角,呈现出战争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侧重呈现战争的后果。战场上兵戎相见、枪林弹雨固然惨烈,犹如二战中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一样有视觉和想象冲击力。然而,战争的遗留问题带给人们更深远的影响,如那些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要面对的艰难人生,亦如《灿烂千阳》中玛丽雅姆和莱拉身处的窘迫境遇,是漫长而又难捱的痛苦折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战争后果的书写更具有现实意义。

### 一 个人日常生活与战争场景的交织

通常而言,战争书写的主人公是战场上的士兵或者是退伍的老兵,表现的大多是战场的血腥杀戮、战士的绝地求生和英雄主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投射等母题。曾艳钰认为:“美国战争文学的叙述者多为美国士兵或者老兵,所有的叙述也都是以美国为中心,讲述美国士兵眼中的战场和战争。”<sup>④</sup>在《灿烂千阳》中,胡赛尼独辟蹊径,从个人日常生活的角度书写战争,将战争融入平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使读者通过和作品人物的共情体验间接经历战争,从而拉近了读者和战争经历的心理距离。

20世纪后半期起,阿富汗经历了一系列政权更迭、暴力革命、对外战争与国内军阀混战,这些政治事件在《灿烂千阳》中有多处呈现。《灿烂千阳》中首先登场的政治事件是1973年的阿富汗政权更迭。此时的玛丽雅姆还生活在泥屋,享受着扎里勒每周一次的陪伴:“每个星期四,扎里勒带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到泥屋。正是他告诉玛丽雅姆,1973年,她十四岁那年,统治了喀布尔四十年之久的查希尔国王被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了。”<sup>⑤</sup>当扎里勒向玛丽雅姆解释政变的来龙去脉之时,玛丽雅姆并没有认真听,最后父女的对话转移到了扎里勒带给玛丽雅姆的礼物上。政权更替无疑是重大历史事件,但对于玛丽雅姆的日常生活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彼时的玛丽雅姆尚未成年,生活在单纯的孩童世界中,享受着简单的平静生活。胡赛尼将这样的政治叙事嵌套在玛丽雅姆和扎里勒父女的家常闲话当中,政治变局在玛丽雅姆听来,也只是如故事一样稀松平常。同时,这样的叙事也提醒读者,在日常生活的平静表象之下,历史的浪潮正暗自涌动,现实生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复调叙事。

1973年政变几年之后,阿富汗发生了“四月革命”<sup>⑥</sup>,胡赛尼再次将这一历史事件编织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小说这样描写这场暴力革命的导火索:

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

回顾历史,此刻的阿富汗正处于政变的前夕,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共产党人被

<sup>①</sup>McLoughlin, Kate. "War and Words,"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 ed. Kate McLough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

<sup>②</sup>转引自 McLoughlin, Kate. "War and Words,"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 ed. Kate McLough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5

<sup>③</sup>李公昭:《美国战争小说研究在中国》,《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

<sup>④</sup>曾艳钰:《当代美国战争小说中的跨国景观与政治》,《外国文学》2017年第1期。

<sup>⑤</sup>胡赛尼:《灿烂千阳》,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40页。(下文引自该小说的不再另行标注)

<sup>⑥</sup>“四月革命”发生于1978年4月,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扶持帮助塔拉基为首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府,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亲苏的塔拉基政权。1979年,塔拉基被杀,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争。

谋杀,一场酝酿着革命风暴的示威游行,这些对于政治圈外的平民百姓来说,成为一种可供围观的政治景观,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了几朵浪花。就连不谙世事的玛丽雅姆也开始好奇“共产党人是什么”“卡尔·马克思是谁”。拉希德不屑于回答她的问题,但玛丽雅姆也很快有了答案:

4月27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她光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玛丽雅姆走到窗边,站在他身旁。她看到战斗机在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它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的耳朵发痛。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烟尘升向空中。

战争的打响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突然打乱,玛丽雅姆光着的脚丫和拉希德的衣衫不整即是战争时期失序生活的写照。当焦虑的玛丽雅姆问拉希德“我们该怎么办”时,得到的答案也只是“只好等待了”。战争是由掌权阶层操控的群体性行为,不受普通平民的控制。战争来临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为之做好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平民百姓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战争来袭,日常生活被打断,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胡赛尼通过细致描写战争阴影之下的普通人的动作、神情、心理,再现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及其制造的心理恐慌。

苏联撤军之后,阿富汗并没有迎来和平,反而陷入了国内军阀势力的混战,在苏联入侵时期一直幸免于战的喀布尔这次也沦为战区。莱拉说“我最讨厌的是呼啸声”,因为这呼啸声是爆炸的前哨,预示着灾难将临,“当她和爸爸坐在餐桌上吃晚饭时,经常能够听到呼啸声。每当它响起,他们的脑袋就会猛地抬起。他们会听着呼啸声,刀叉停在半空,嘴里尽是未咀嚼的食物”。胡赛尼将战争的印迹刻上餐桌,停在半空的刀叉和嘴里未咀嚼的食物生动捕捉了战争对日常生活的粗暴打断,通过子弹、炸弹这些毁灭生命的暗恐力量震慑人们的生活,使人产生身心两方面的恐惧,而这样的恐惧并不随着白日的消逝而结束:

每当到了晚上,莱拉就会躺在床上,

看着她的窗户反射出的几道突然亮起的白光。屋子摇摇晃晃,几片石灰从她房间的天花板掉下来,而她静静地倾听着冲锋枪开火的嗒嗒声,数着有多少枚火箭弹划过上方的天空。有时候,火箭弹喷射出的火焰很亮,人们甚至可以借着它的光线看书;在这样的夜晚,莱拉便会彻夜难眠。而在莱拉能入睡的夜晚,她又总是梦到炮火、和身体分离的手或脚,还有不断呻吟的伤者。

战争从白天持续到夜晚,用人为的活动打破了自然时间的疆界,从而颠覆建立在自然时间基础之上的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从白天被打断的三餐,到夜晚睡梦中的梦魇,战争的阴影倏忽来去、无处不在。

除了打乱日常生活的节奏之外,战争也改变了个人的生活轨迹,重塑了人物的命运。以《灿烂千阳》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莱拉的经历为例。莱拉出生于喀布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哥哥和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父亲对莱拉从小疼爱有加,妈妈在哥哥们去参军之前也对她视若珍宝,她本来可以像父亲一样去读大学,因为“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东西就是她的教育”,因为爸爸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然而,战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剥夺了父亲为她规划的理想人生。首先是莱拉的两个哥哥在她2岁那年离开家门去参加反击苏联入侵的圣战,几年后不幸殉国。两个哥哥的死对莱拉的母亲打击很大,从此以后母亲终日卧床,沉浸在哀悼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将会折磨妈妈余生的病痛出现了。胸痛,头痛,关节痛,夜间盗汗,双耳痹痛,还有别的人摸不到的肿块。……多数日子里,妈妈躺在床上。她穿黑色的衣服。她揪自己的头发,掐她的嘴唇下面那颗痣。……莱拉相信,在妈妈眼里,她跟两个哥哥一样,也是不存在的人。”母亲的丧子之痛是战争带给普通人的极端痛苦,也间接导致了莱拉的“丧母之痛”,使她早早地失去了母亲的关爱,然而这只是莱拉人生轨迹出现转折的开始。为了躲避战乱,莱拉的爱人塔里克和父母一起移居国外,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无奈分别。而正当莱拉和父母也打定主意要离开喀布尔时,一枚炮

弹击中了她们家的房子,莱拉虽然被拉希德和玛丽雅姆救了过来,但失去了父母、无家可归。狡诈的拉希德设计欺骗莱拉说塔里克已死,一无所有又怀着塔里克的孩子的莱拉出于无奈,嫁给比自己大四十多岁的拉希德,成为他第二个妻子。战争剥夺了莱拉的一切,也加剧了莱拉所面临的困境,正如拉希德所言:“她可以离开。我不会挡住她的路。但我怀疑她走不了多远。没有食物,没有水,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处都有子弹和火箭弹在飞来飞去。她可能被拐卖、强奸,或者被人割开喉咙,扔进路边的臭水沟。”在将所有普通人抛入无尽苦难的同时,战争在伊斯兰文化主导的阿富汗也成为男性控制女性的帮凶,通过限制女性的日常活动来加强男性的权势地位。

## 二 战争硝烟中的民族文化坚守

战争是残酷的,对文化的破坏力无疑是巨大的。古今中外的历次大战后,都有大量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阿富汗历史上就是外族入侵的首选之地,也因此多灾多难。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阿富汗进入内忧外患、政变频发的动荡期,传统文化多次遭到破坏。战争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破坏固然可叹,战争后的文化之殇亦令人痛心。二十世纪末,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占据了统治地位,践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塔利班是文化、教育的疯狂破坏者,曾在2001年炸毁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灿烂千阳》中,胡赛尼描述了塔利班丧心病狂的文化杀戮:

那些男人挥舞着斧头,冲向破败已久的喀布尔博物馆,将伊斯兰文明之前的雕像砸得粉碎——都是圣战组织还没来得及抢走的文物。塔利班关掉大学,打发学生回家。他们把挂在墙壁上的画作摘下来,用刀剑将它们劈成碎片。他们踢碎电视的屏幕。除了《古兰经》之外,所有的书籍都被成堆地烧掉,书店被迫关门大吉。卡里里、帕吉瓦克、安萨里、哈吉德赫坎、阿什拉奇、贝塔伯、哈菲兹、雅米、内札米、鲁米、伽亚谟、贝德尔等诗人的作品被付诸一炬。

“挥舞着斧头”“砸”“劈”“踢”“烧”,塔利班毁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触目惊心。然而,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虽然再现了战争对文化的无情摧毁,但同时从平民的角度探讨了阿富汗文化传统以及对阿富汗独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传承,保存了阿富汗文化的火种。

《灿烂千阳》一书的标题首先彰显了胡赛尼坚守阿富汗文化独立性、传播民族文化的决心。小说中,“一千个灿烂的太阳”出自莱拉父亲哈基姆之口。当时,莱拉和父母正为离开喀布尔而收拾行装,父亲在整理自己的书籍,因无法全部带走而黯然神伤。此刻,父亲吟诵了波斯诗人赛依伯在17世纪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月亮/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据学者考证,这首诗是诗人赞美喀布尔的作品,诗句中提到的“一千个灿烂的太阳”是指“美丽的喀布尔妇女”<sup>①</sup>。在作品尾声部分,经历了战乱的莱拉在2003年终于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成了一名教师,不经意间想起玛丽雅姆。莱拉虽无法探访玛丽雅姆的墓地,但她时刻能感受到玛丽雅姆的存在:

玛丽雅姆离得并不遥远。她就在这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给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和铅笔之中。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她就在阿兹莎背诵的诗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显然,玛丽雅姆的善良、勇敢、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使得她成为如太阳般光辉暖人的存在,也是无数命运多舛但灵魂高洁的喀布尔妇女的化身。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之下,太阳一般代表着男性的孔武有力,而月亮则象征着柔美圣洁的女性。作为兼跨两种文化的美国族裔作家,胡赛尼对两种文化的差异自然熟稔。他着意用“一千个灿烂的太阳”这一独特的阿富汗传统文化意象作为自己小说的标题,并且在小说中讲述了两位阿富汗女性如何承受命运的坎坷磨难、发出自身光

<sup>①</sup>此处参考《灿烂千阳》中译文作者李继宏为译文附录的《喀布尔》一诗译文做的脚注。

热的故事,表明了他试图让更多读者了解阿富汗独特民族文化的良苦用心。胡赛尼用《灿烂千阳》作题,既凸显了小说对阿富汗女性命运的关注,又弘扬了阿富汗传统文化,旨在表明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虽历经战火摧残但依然坚忍顽强。

胡赛尼的战争书写在展现战争对人类文明摧残破坏的同时,也将文化寻根、文化重建引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小说中,胡赛尼将莱拉和塔里克的爱情放在古波斯文化叙事的框架之内,表达了他对阿富汗传统文化的刻意挖掘和着重呈现。在西方为主导的文学传统中,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誉为爱情经典,成为忠贞爱情的隐喻与象征<sup>①</sup>。在《灿烂千阳》中,莱拉与塔里克自小相识,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青春悸动、两情相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虽未以婚姻的形式公开,但已经被街坊邻居眼见口传:

有一天,她和塔里克手拉手走在街道上,遇到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穿着布卡的妻子。和他们擦肩而过时,拉希德开玩笑说:“那不是赖里和玛姬浓吗?”他说的是内扎米那首妇孺皆知的12世纪浪漫诗中一对命运悲惨的恋人——爸爸说那首诗是法尔西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他还加上一句,内扎米创作这个凄恻爱情故事的时间,比莎士比亚早了四百年。

在这里,胡赛尼抛弃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西方主流文化的情侣意象,将莱拉和塔里克的爱情类比为古代波斯诗人内扎米作品中“赖里和玛姬浓”的故事,并且强调这一爱情故事早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四百年这一史实。胡赛尼在作品中引入古波斯诗人,意在为古波斯文化招魂,激发读者对阿富汗这块土地上悠久历史的神往与想象,寻找阿富汗的文化之根。虽然在当今世界,阿富汗经历了多次战乱,至今仍处于多事之秋,诸多文化遗产如巴米扬大佛也历经浩劫遭到破坏,但阿富汗文化的根却一直深植民心,正如“赖里和玛姬浓”的故事一样流传在街头巷尾,无论是作为阿富汗知识分子代表的莱拉的父亲哈基姆,抑或是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拉希德,都对此烂熟于心。

胡赛尼对莱拉这一人物的情节设置也体现了他对阿富汗文化浴火重生怀有信心。生于1978年“四月革命”的当晚,莱拉被戏称为“革命姑娘”,到小说结尾时的2003年,莱拉一直生活在阿富汗最动荡的年代里,可以说是战乱时期普通人特别是阿富汗女性的代言人。父亲哈基姆是个知识分子,也是对年少的莱拉影响最大的人。9岁的时候,莱拉跟随父亲来瞻仰巴米扬大佛时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大佛是在一片被阳光晒得发白的石壁上被开凿出来的,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莱拉想象将近两千年之前,它们也是这样俯视着路过这座峡谷的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巴米扬大佛代表了阿富汗悠久的民族文化,用父亲的话来说,是“祖国的遗产”,可以借此“了解它丰富的过去”。塔利班统治时期,巴米扬大佛被斥为“偶像崇拜和罪恶的物体”而被炸毁,勾起了莱拉对从前的回忆。虽然巴米扬大佛被破坏了,但父亲的教导深藏在莱拉心中。在小说的结尾,阿富汗的政局随着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塔利班从大城市撤退而暂时安定下来,莱拉毅然放弃了异国的安宁生活回到喀布尔,成为恤孤院的法尔西语教师。莱拉的回归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莱拉代表着自己挚爱的父母、兄长以及玛丽雅姆回到喀布尔,“让他们能够通过她的眼睛”看到喀布尔的变化,实现了生命的代际传承;另一方面,莱拉重返喀布尔执教是为了重建阿富汗文化。语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遗产的核心介质,法尔西语也叫达里语,被称作“阿富汗的波斯语”<sup>②</sup>,是很多阿富汗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语言,教授法尔西语本身就是阿富汗民族文化的延续。只要语言的堡垒不倒,文化的城墙就会挺立。

## 结语

文学文本是作家捕捉社会历史脉动的经典介质。Neilson认为:“作为对真实世界的再现,文学文本建构想象的社会秩序、人物体系以及政治经济。这些文本富含并回应当前的意识形态争

<sup>①</sup>李建盛:《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的审美真理阐释》,《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sup>②</sup>郭建荣:《“一带一路”背景下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及启示研究》,《外国语言与文化》2020年第2期,第126页。

斗。”<sup>①</sup>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的战争书写远离了传统战争文学的宏大叙事,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展现战争的野蛮、残酷。在揭示战争对日常生活破坏的同时,胡赛尼关注战争年代的民族文化保存与传承,在满目疮痍的文化废墟中依然心存希望,对阿富汗民族文化的重建保有信心。正如小说最后一章引用的古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句

所言: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花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  
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  
引,请别悲哀

## A Study of Hosseini's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WANG Y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fghanistan suffered from a series of political coups and armed conflicts in modern history, and the literary works set in Afghanistan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tinged with the color of warfare. Different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of classic war fictions, Hosseini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stead of battling soldiers as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nd captures the shadow of war in everyday life, lending a quotidian dimension to warfare. Based on the quotidian representation of war, Hosseini accentuates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fghan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of 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war.

**Key words:** Khaled Hosseini;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representation of war; everyday lif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sup>①</sup>Neilson, Jim. *Warring Fictions: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Vietnam War Narrativ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14.